臺大歷史學報第 61 期
2018 年 6 月，頁 447-474

BIBLID1012-8514(2018)61pp.447-474
2017.10.11 收稿，2017.12.31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61.09

§書評§

杜建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47 頁。

吳 國 聖*

一、背景介紹

2015 年出版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是迄今收錄西夏碑石資料最為完整的著作。在此之前，僅有 2005 年出版的《中國藏西夏文獻》叢書第 18 卷設有西夏金石專集〈金石編．碑石、題記卷〉。該卷出版後，副主編杜建錄繼續蒐羅、整理目前已知的党項、西夏相關碑石，再行增補，10 年後出版了單行本《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1]比諸前作，本書收錄更多碑石，並附有碑石概論以及部分碑文的研究文章，可謂青出於藍，是目前最新、最完整的西夏金石總集。

「西夏史」是內陸亞洲歷史中十分引人矚目的一個時期。與遼金元等非漢民族王朝歷史最顯著的不同點在於：「西夏」並未被視為一個中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E-mail: d98123005@ntu.edu.tw.

1 杜建錄，1962 年生，寧夏同心縣人。史學博士，現為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主編《西夏學》、《西夏文獻研究叢刊》、《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党項西夏文獻研究：詞目索引、注釋與異名對照》等西夏學重要著作；另有《中國藏西夏文獻研究》、《西夏史論集》、《西夏經濟史》、《西夏社會文書研究》（與史金波合著）等西夏學專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的朝代，未有專史，僅有部分列傳。[2]殘存的史料種類較少，漢文史料散見於各種史籍、文集、方志之中，內容較為零碎，且其記載多由漢文化角度出發，人名、職官、制度等缺乏足夠參證的背景資料，以致研究者欲理解西夏文明，常有隔靴之感。相對於漢文史料，西夏文文獻至為重要，以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而言，雖對西夏語言文字已有相當掌握，但凡該文獻缺乏夏漢、夏藏等雙語對譯資料者，依舊不易通讀。總言之，夏、藏、漢三種語文的西夏史料亟待重新整理與編纂。幸而近代有韓蔭晟窮數十載編纂《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3]又獲益於各國藏敦煌、黑水城西夏文獻之逐步整理出版，[4]以及大型叢書《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的問世，[5]使目前尚存且已知的重要夏、漢文

2 與「党項」相關的正史列傳有《隋書・党項傳》、《舊唐書・党項羌傳》、《新唐書・党項傳》、《舊五代史・党項傳》、《新五代史・党項傳》、《宋史・党項傳》；以「西夏」為名的列傳有《宋史・夏國傳上下》、《遼史・西夏國外紀》、《金史・西夏傳》等。

3 韓蔭晟（1919-2003），主要著作為《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 初版，2000 年新版），共 4 卷 9 冊，估計總篇幅達 550 萬字。

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共 17 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 15 冊之後改名《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截至 2018 年 6 月已出版至第 26 冊，持續出版中。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共 5 冊。塔拉、杜建錄、高國祥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共 10 冊。塔拉、杜建錄、高國祥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全 1 冊。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全 1 冊。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編，《日本藏西夏文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11），全 2 冊。

5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編，《中國藏西夏文獻》（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共 20 冊。寧夏社會科學院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全 4 冊。兩者收錄文獻有部分重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夏史料，大抵網羅於茲。西夏金石碑銘過去多隱沒不彰，[6]特別是久閟地底千年幽宮的墓誌銘一類，保存不少傳世文獻闕載之故實，史料價值甚高，值得研究者惠予注目。但除了少數較為人知的碑刻（如〈凉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居庸關六體石刻〉等）之外，以其分布地點分散各省，且多收藏於地方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館，外人難以知曉，研究甚為困難，過去並未獲得足夠的重視。

本書前作《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8 卷〈金石編．碑石、題記卷〉，首次集結與西夏相關的碑石 36 種，為銅版紙彩印，精裝八開本；除有碑銘拓片及簡要的背景說明之外，附有碑石錄文；全書 272 頁，碑石部分僅占約 188 頁，餘為題記、銘文。增補後新出版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則為平版紙黑白印刷，精裝十六開本，全書共 347 頁，亦附有拓片或碑面照片；大部分碑石提供錄文或譯文，書末附錄為年代、國名、地名、職官、人物名字、族姓、封號等 7 種索引。全書共收 63 件（碑刻 47 件、石刻 16 件），依時間先後分為「西夏前身夏州拓跋政權」、「西夏時期」，以及「元明時期西夏遺民及其後裔碑石刻」等三部分，但不包括宋朝境內府州折氏碑石刻。[7]

與前作相比，《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不收墨書題記、[8]岩畫、[9]印字磚、瓷刻、織品、銅製品上的西夏刻文、銘文，以及西夏陵區出土的夏漢文殘碑等，[10]但新增補入 31 件墓誌與碑刻。就石刻文而言，新作收

6 「西夏學」始於嘉慶九年（1804）左右「凉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為世人重新發現。在此之前，雖有少數西夏文字的錢幣為歷代錢譜收錄，但並未與西夏連結上關係。傳世的西夏碑銘數量不多，也少收錄於歷代著作（如方志、文集），遑論為正史採擷。

7 府州折氏為唐宋藩鎮中的著名蕃將家族，出身党項族，相關碑文甚多。如果收錄，書中將有近半篇幅專論折氏，故西夏金石書籍多半將與折氏相關者排除在外，另行處理。

8 指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夏佛塔內牆面、柱面上之西夏文墨書題記。

9 收錄部分摩崖石刻。

10 西夏陵區曾經存在大量夏漢文神道碑，但均受人為破壞，殘剝殆盡，目前已發現之殘碑總計將近 4,000 塊，最大殘塊只包含數十字碑文，其餘僅有數個字或不到 1 字。早期的研究，見李範文編釋，寧夏博物館發掘整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北京：文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錄數量近乎倍增。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收錄杜建錄 7 篇論文，包括党項與西夏碑石概述、敘錄，以及書中收錄的幾件墓誌銘考釋；下篇則依發現地（陝西、內蒙古、甘肅、寧夏、北京、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雲南、江蘇、廣西等 12 省市）分類列出各地碑銘，加上不分省市的石刻題記，逐一介紹之。書中明確區分「碑銘」（又稱碑刻）、「石刻題記」（又稱為石刻），兩者的差異在於其載體：「碑銘」為石碑上的銘文，「石刻題記」為非屬石碑本體的載體上的銘文，包括石碑底座、券洞、摩崖、石室、巨石上的銘文。

本書每一份現存碑石都提供拓片或照片，版面較其前作縮小一半。作者除了提供拓片全影，也在必要時將圖片分割並放大。拓片前有出土地、收藏地與尺寸、現狀等資訊，並查閱一些已發表的相關著作，提供錄文中不同字詞的讀法。部分非漢文碑銘，也引用前賢的研究，附上譯文。錄文有標點，斷行、平抬或無法讀解處均有標示，[11]體例儼然，整理完善。

二、評論與意見

本書為西夏金石最完整的新作，筆者給予高度肯定。史料整理的著作編輯相當不易，謹此提供一些意見，以備參考。

（一）體例

首先，本書附有 7 種分類索引，惜未能發揮引得（index）應有的作

出版社，1984）。書中收錄西夏文 526 塊、漢文 298 塊，共計 824 塊。史金波曾撰文補充、修正部分解讀，見史金波，〈西夏陵園出土殘碑譯釋拾補〉，《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試刊號（蘭州），頁 158-166；後收入氏著，《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488-502。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等編之《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9 冊收錄相關殘碑的拓片圖版 2,297 塊，然無釋文與解讀研究。上述材料雖屬本書應收錄之西夏碑石，但因數量龐大，需另行研究處理。

11 唯全書錄文原有之空格與挪抬均已省略，未標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因其內容和出處頁碼乃依據前作《中國藏西夏文獻》編寫，無法用以檢索本書詞語。讀者需先查閱該詞語位於前作何種碑銘之中，才能對照本書目錄，輾轉檢出。[12]索引中還有不少僅見於前作《中國藏西夏文獻》，並未收錄於本書的其他刻文之語彙。[13]至於本書新增補的 31 件碑銘，內容均無法於索引中查得。

本書部分拓本與《中國藏西夏文獻》不同，有些拓片質量卻較前作為差，字樣模糊或破損缺字更甚。例如頁 79 的〈唐靜邊州都督拓跋守寂墓誌銘〉拓片 5-4 的下緣，被截掉約 3 個字的長度，不能得知內容。〈敦煌莫高窟六體真言碑〉（頁 164）、〈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頁 166-169）、〈保定西夏文經幢〉（頁 218-221）、〈居庸關雲臺西夏文石刻〉（頁 284、287）等重要碑銘之拓片過小，文字不易閱讀。〈元勝公和尚道行碑〉（頁 225-230）、〈濟南大靈岩寺碑〉（頁 252-254）、〈重修彌陀岩石室記〉（頁 296）、〈重修碧霄岩記〉（頁 298）等碑銘無拓片，僅提供碑石照片，字樣黑白反差過小，多處文字無法辨識。

持平而言，本書錄文有許多可取之處。部分墓誌中不易辨識的文字，以及一些異體字，作者盡力提供正確的錄文。[14]又全部錄文凡於原碑刻換行處，均以下引號『」』標明，對於需參照拓本的讀者而言，有助於定位錄文在實體碑銘中的位置。這些換行記號正是前作《中國藏西夏文獻》及其他同類金石整理著作所缺乏者。

不過本書錄文雖有分行記號，卻無行號，圖文對照時，閱讀較為吃力。書中引用的非漢文碑銘譯文，有些附有部分不完整的行號（如〈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回鶻文部分、〈感通塔碑〉漢文部

12 本書頁 308 註明索引之資料出處為「以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編輯，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藏西夏文獻》為依據，『/』前為冊數，『/』後為頁碼。」索引中全部內容與頁碼均指向前作《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8 冊，與本書並無關連。

13 如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題記、拜寺溝方塔、宏佛塔等。

14 如〈大晉綏州刺史李仁寶墓誌銘〉（頁 105-107），原墓誌字體潦草，書寫隨意，而本書中之錄文大部分均正確錄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15]有些全無（如〈西夏黑水建橋敕碑〉藏文面、〈感通塔碑〉西夏文面），並未統一。目前中國金石碑銘與古代文書的研究著作，少有在錄文或圖版上標明行號者，造成讀者查閱核對原文時的負擔，寫作引用時也容易產生指涉不清或漏行、漏字的問題。建議此類史料整理與研究時，除了換行記號之外，亦能正視數字行號等文獻學標記的重要性。[16]

（二）歷史語言文獻學（Philology）考釋

本書收錄與党項、西夏相關的漢文碑銘，以及多種不同語文的胡語碑銘，全部碑文均涉及非漢民族的史事。研究者不僅要有良好的分析古代漢語與歷史文獻的訓練，更重要的是，需具備相應的胡語文獻解讀能力，方能有效提升譯解漢文碑銘的正確性。

1. 漢文錄文

漢文錄文方面，前作《中國藏西夏文獻》採繁體字，本書則全面改為簡體，進而出現了漢字簡化後的新問題。[17]如頁 132「晉祁奚之后也」，依上下文判斷應為「後」而非「后」。又如「岳／嶽」、「云／雲」、「系／繫」、「發／髮」、「并／並」等均歸併為一字；還有許多用字簡化後，成為完全不同的字，閱讀、引用時必須謹慎參照拓片還原。

---

15 附有行號者，有些與其他著作有出入。例如書中「感通塔碑」（頁 155-156，原書錄為「感應塔碑」）之漢文部分與西田龍雄的錄文編號相差一行。參見西田龍雄，《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I（東京：座右宝刊行会，1964），頁 157-176。

16 圖版與錄文、索引都清楚標明行號的例子，見栗林均、松川節，《『西藏歷史檔案薈粹』所收パスパ文字文書》（仙台：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16）。

17 《中國藏西夏文獻》的繁體字也不盡然符合原文，例如第 18 冊頁 52 關於〈後周綏州刺史李彝謹墓誌銘〉的說明中，有「後魏之苹係」一句，「係」應作「系」。該書底稿應該是以簡體輸入，以程式轉為繁體，然因簡體字有「繁體多字歸併為簡體一字」的特性，簡轉繁有時會使無須繁體化的字過度繁化（如系→係、干→乾／幹、只→隻、云→雲），以致「系」字錯誤對應為「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錄文尚有一些需要斟酌的地方，以下試舉數例：[18]

頁 76-82：拓跋→拓拔[19]

頁 123：焜耀→焜燿、膏膜→膏膈、番渾→蕃渾、
臨敵克就於□→臨敵克就於捷、[20]傷痛→傷慟

頁 124：忱→堪、垂節→垂範、幕幕→冪冪

頁 129：扣火回風→扣火迴風、良藥→上藥、雞□→雞口、[21]
枝流相因→枝派相因

頁 130：幾（几）→凡、[22]愧→媿

頁 132：恭溫→溫恭、幼兒→幼而、才→纔、「三十餘稔」、[23]
梧桐枝→梧桐之、妝閣→粧閤、踪橫→蹤橫、
疚火→夜火、[24]今草→令草、葛藟常美→葛藟常繫、
殉位→侚位

18 以下條列中，A→B 表示原書作 A，應更正為 B。

19 原碑文為「拔」。雖然大部分當代工具書或教科書僅收錄「拓跋」為詞條或行文用語，仍不宜輕易認定「拔」為訛誤或通假字而更改原文。令人驚訝的是，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中，幾乎毫無例外地作「拓拔」，而非「拓跋」。「拓拔」二字在史書中常見，不見得是「拓跋」之誤書。

20 原誌文作「」，即「捷」字之異寫。此字形曾廣泛見於唐代墓誌及敦煌吐魯番文書。如龍朔二年（662）〈唐陪戎副尉張伯通墓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京大人文研〕藏拓片，編號 TOU0357A）作「」，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敦煌文書 Pelliot chinois 3906 中作「」。

21 「雞口」與「雞首」意近，誌文中後接「爭先」，表「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之意。本書將「口」字誤輸入為缺字的方框「□」。

22 原作「九」字，應識為「凡」，非「几」字。

23 作者腳註「『稔』當為年」，認為「稔」為錯字。實則「稔」為穀熟之意，穀一年一熟，一稔即為一年之代稱，原誌文無誤。

24 原誌文作 ，此字形應為「夜」字，而非「疚」。《集韻・去聲・禡韻》「夜」字項下有「」，字形完全相同。見丁度等，《集韻》（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軍刻本），去聲八，葉 19a；影印本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編委會，《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27 集韻》（北京：線裝書局，2001），頁 2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 139：銀河胤流→銀河胤派；

頁 149：殊流→殊派、三月授官→三月內奏授官、

三彭斂氣→三清斂氣、[25]遐齡罔績→遐齡罔續

頁 198：大名路達魯花赤→大名路都達魯花赤

頁 165：妙應→妙因、阿速女→阿速歹、結來女→結來歹；

另外此碑「左側」、「右側」兩者標示顛倒

頁 195：狀→庄／莊[26]

頁 201：謚→謚曰

頁 234：乃→迺、翥→蓎、延禧→延釐、馬日→馹、

□幽宮→閟幽宮、□于此→閟于此

頁 245：「奚克致是猗歟？盛哉。」→「奚克致是？猗歟盛哉！」

頁 247：性□直→性耿直

頁 250：姹→奼

頁 263：□→塿、末句「書於濟南」之後漏錄「□公祠畔」四字

頁 266：尊聖→尊勝

頁 291：計又七日→廿又七日

頁 293：賽目不花→賽因不花、攜游→偕游、因因→因

書中多份拓片不清晰，難以辨識，除繁體簡化產生的別字外，還有一些輸入與斷句可商之處。此處僅列出筆者閱讀過程中隨手記下者，未全文校對。碑銘之過錄著實不易，著者提供錄文有利於閱讀，引用者若能配合圖版，深入參校原文，兩者可相輔相成。

25 此處「清」字左右部件對調，作者誤識為「彭」字。「三清」為道教至境與至尊。

26 原誌文作「」，宋巾箱本《廣韻》有「」，註明為「莊」之俗字。見陳彭年，《宋本廣韻．永錄本韻鏡》（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頁 50。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藏敦煌文書 Or.8210/S.2073 Recto 多次出現「」，唐貞觀二年（628）〈郭通墓誌銘〉（京大人文研藏拓片，編號 TOU0005X）有「」，亦為「莊」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非漢碑文之錄文及其漢譯文

本書中至少收錄 9 種非漢文碑文，包含蒙文、藏文、梵文等，[27]均未提供非漢文的錄文。而全書主題所繫的西夏文碑銘，全書僅〈元宣差大名路達魯花赤小李鈐部墓誌〉（頁 199）一件錄有 11 個西夏文字「𗍫𗥃𗴲𗐱𗼇／𗍊𗏵𗾔𗥤𗹦」。[28]其他西夏文碑，如〈西夏凉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29]〈保定西夏文經幢〉、〈西夏陵碑座題刻〉、〈賀蘭山岩畫西夏文題刻〉、〈居庸關雲臺西夏文石刻〉、〈敦煌莫高窟六體真言碑〉的西夏語碑文隻字未收。相較於漢文碑銘均有錄文，胡語錄文卻付之闕如。宜全面提供非漢語錄文，或者列出何種著作曾經提供錄文，讀者才能據以查考書中引錄譯文之正確性。

書中引用的譯文亦有些值得討論之處，如〈西夏黑水建橋敕碑〉（頁 163）提供之譯文，是將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文中的逐詞譯連接成

---

27 「居庸關雲臺」與「敦煌莫高窟六體真言碑」二者語文更多。居庸關雲臺券洞東西二壁有漢、梵、藏、蒙（回鶻蒙文、八思巴蒙文）、西夏等語文；〈莫高窟六體真言碑〉有漢、梵、藏、回鶻、八思巴、西夏等 6 種文字。

28 錄文中的「𗍊」[sew^{2}]字，作者誤為「𗏵」[tsəj^{1}]，此處筆者已更正。「𗏵」字雖有「小」義，可對譯漢語「小」，然其為「小」的西夏語固有詞，與「𗍊」可能為漢語借詞有所不同，兩者不能混淆。「𗍊」字曾於西夏文《妙法蓮華經》中對譯樂器「簫」。見西田龍雄編，《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写真版：鳩摩羅什訳対照 *Xixia Version of the Lotus Sutra／Текст Сутры Лотоса на Тангутском (Си Ся) Языке*》（東京：ロシア科学アカデミー東洋学研究所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ク支部，2005），頁 114（寫本）、145（木刻本）。「簫」在《掌中珠》325 對應西夏語的「𗹦𗾔」[tshjiH^{1} lju^{1}／賊六]，而左側漢字「簫」的西夏對音為「𗥤」[sew^{2}]，與「𗍊」[sew^{2}]發音完全相同。李範文《夏漢字典》提到該詞例時，應係轉引自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II*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p. 329，僅標明出自《妙法蓮華經》。因此《夏漢字典》所載之出處「蓮 II 17」有問題，見李範文編著，賈常業增訂，《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修訂重印再版），頁 613；李範文編著，《簡明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458。《妙法蓮華經》中「𗍊」對應「簫」者，僅出現於卷 6 之〈分別功德品〉，參見高橋まり代，《西夏文妙法蓮華経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8），頁 1185。

29 此處「感應塔碑」之名係依照本書原文，與註 6「凉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為同一碑銘。相關問題請見後文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句，無法通讀；甚至保留藏文的原詞序（S-O-V），如「朕之旨聽！」[30]而視為所謂的「直譯」，實非正確的漢譯文。[31]

此碑既串連逐詞譯，復於頁 163 下方腳註說明「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以漢語語感將這些連起來的逐詞譯加以斷句。例如第 4 行「འདིར་ཆུ་བྱག་ཆེན་པོ་ལོ་ཕྱར་སྡེ་ཚྭགས་མང་པོ་གནོད」的逐詞譯為「此-河-泛-大-年-每-人-畜-多-危」，作者將其斷句為「此河泛大年，每人畜多危」，誤也。「ཆུ་བྱག」是「ཆུ་བྱག་ས」的簡寫，意為「（水）氾濫」，前方的「འདིར」是「འདི（此）」加上位格標記，意為「於此」，並非限定「ཆུ་བྱག」的定語，譯為「此河（泛）」不妥。「年-每」是「ལོ་ཕྱར」的對譯，意為「每年，年年」，二字不能點斷，使同一語詞誤分前後兩句。「མང་པོ（多）」是修飾前方「སྡེ་ཚྭགས」（人畜）的定語，不可和其後動詞「གནོད」連讀為「多危」。整句話意為「在此，（河水）每年大氾濫，損害許多人畜」。「逐詞譯連讀」非實際「直譯文」，應尊重胡語的語法事實，避免以漢語揣摩或臆想胡語，以忠實呈現文獻本意。[32]

另有一些問題也需要胡語知識方能正確讀解。同樣是〈西夏黑水建橋敕碑〉，第 18 行「མེ་ཕོ་སྤྲེའུ་ལོ་རྒྱ་ཁྱུ་ས་ཉི་ཤུ་ལྔ་ཉི་མ་ལ་རྩོ་ཡིག་བསྒྲངས།」，作者引用為「火陽猴年月九二十五日石字之」，其最後一字對譯藏文「བསྒྲངས」（「སྒྲོང་བ」的過去式，意為「豎立」的「立」）者，因王堯原錄文為手寫稿影印，作者將行書的「 （立）」誤識成「之」。第 3 至 4 行「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 菩提薩埵」，作者寫成「善菩提埵」，21 行「ཡིག་མཁན / 筆手」（王堯筆跡：筆于），作者誤識為「筆于」。[33]這些

30 對應的藏文是「[བདག]（朕）·གི（之-屬格標記）·བཀའ（旨）·ཉོན་ཅིག（聽-命令式）」，正確的翻譯應作「聽〔朕〕之旨！」

31 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 年第 1 期（北京），頁 52-55。此文未提供藏文碑銘之全文漢譯，僅有單詞逐字譯。又其藏文碑文有將近一半是原碑漫漶無法見得者，由該文作者自行猜測補上。

32 相對應的漢文面文字為「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此碑漢藏雙語之文意大致相近，但並非精確地一一對應。漢文面雖是「此河」，藏文面的漢譯文仍須尊重藏文原文。

33 王堯正確書寫為「筆手」，是作者轉錄時誤錄，又因未諳藏語文，沒有意識到這個字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必須從胡語出發，瞭解相關名相與語法，才能意識到問題所在。

研讀漢語文獻已經不容易，在引用胡語相關研究時，宜格外謹慎。書中多種非漢文碑銘已不止一次經學者研究，部分碑石有比作者所引用的研究更新、更完整的著作，提供了不一樣的譯文與解讀方案。或可列出相關文章書目於碑銘之後，裨利讀者按圖索驥，自行決疑。[34]

3. 「賽目不花」實為「賽因不花」

對胡語深入了解，有助於解讀漢文碑銘的例子在本書中還有不少，例如書中〈廣西棲霞洞必申達兒題刻〉（頁 293），有人名「賽因不花」，錄文中識為「賽目不花」。其實就漢字字形可以提出修正意見：碑文內「」（因）字中央的「大」作「工」，「」為「因（囙）」之異體字，形似「目」字故致誤。同樣字形的「」字又見於同一墓誌之行 10「」，作者此處亦識為「因」，可無懸念。[35]以胡語而論，「賽因不

譯上的不合理處。「ཟམ་ཁྱད་」為動作的施行者，置於動詞之後，為動詞的名物化標記（Nominalization marker）；也用於名詞後，表示與該名詞相關的人。

34 以「凉州感通塔碑」為例，至今尚無學者能完善地解讀全文。本書引用的是陳炳應在 1985 年出版的釋文，見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頁 110-113。該釋文雖已參照多種拓片，後人指出單就其漢文錄文已發現 40 幾處錯誤，見吳景山，〈石文字資料整理過程中的幾個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 年第 4 期（吉林），頁 25-26。此碑除陳炳應之外，還有多種研究，例如：羅福成，〈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4 卷第 3 期（1930，北平），頁 151-177；西田龍雄，《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I，頁 157-176；史金波，〈凉州感應塔碑西夏文校譯補正〉，《西北史地》1984 年第 2 期（蘭州），頁 47-5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頁 241-250。Ksenia Kepping, “The Famous Liangzhou Bilingual Stele: A New Study,” *T’oung Pao* 84, no. 4/5 (1998, Paris), pp. 356-379. 吳峰天，〈「凉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再認識〉，收入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212-215；彭向前、侯愛梅，〈《凉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銘互文見義修辭法舉隅〉，《寧夏社會科學》2016 年第 6 期（銀川），頁 213-216。上述各文彼此差異甚鉅，多方參考可避免過度依賴一家之言。

35 此字形已見於東漢〈史晨碑〉、〈西狹頌〉等著名碑銘，以及許多歷代墓誌，並不罕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花」實為蒙古語人名「ᠰᠠᠢᠨ ᠪᠤᠭᠤᠰᠠ/ᠪᠤᠭᠤ」（sain buqa / buq_a）的音譯，「賽因」在《元朝秘史》中音譯為「撒因」，旁譯為「好」；[36]「不花」音譯為「不[中]合」，旁譯為「強牛」。[37]名曰「賽因」、「不花」之人，廣泛見於蒙古文獻中。「賽因不花」連用之名，《元史》中凡十四見，有前冠魏、楊、朴、袁等姓者，族屬並不一定是蒙古人。《明實錄》中十三見；波斯文《جامع التواريخ / 史集》亦載有同名之人「صا ين بوقا」（ṣāʾ ÿn bwqāʾ），均可作為參考佐證。[38]

4. 「瀉作使」versus「寫作使」

又如〈西夏黑水建橋敕碑〉（頁 162）中的落款，有「瀉作使安善惠刊」，首字「瀉」在先行研究中未曾受到質疑，錄文均作「瀉」字，[39]且認為「瀉作使」是管理水利工程的官職。[40]但筆者參照該碑背面的對譯吐蕃碑文「།ཡི་གེ་བརྐོ་མྱི་ཞི་དྒན་ཞན་ཧྱི།」（yi ge brko myi zhI dgan zhan hyi），[41]「ཡི་གེ」為「文字」或「文件、書信」，「བརྐོ་མྱི」為「刻寫

36 凡三十三見，茲以首次出現處為代表：《元朝秘史》（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長沙葉氏觀古堂據元足本景鈔刊本），卷 1，葉 4a-b。或見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2。現代蒙語為ᠰᠠᠢᠨ（sain [sæːn]，新蒙文 сайн），意為「好」。

37 《元朝秘史》，卷 3，葉 7b；卷 7，葉 37b。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頁 86、235。現代蒙語為ᠪᠤᠭᠤ（buq_a [bʊx]，新蒙文 бух），意為「公牛」。

38 此人屬蒙古王族，與該碑銘中的僉憲賽因不花應非一人。رشيدالدين，《جامع التواريخ》（土耳其 Topkapı 宮〔Topkapı Sarayı〕藏 1317 年波斯文寫本，編號 1518），葉 176b。

39 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頁 51-63；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頁 465；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 140；佐藤貴保、赤木崇敏、坂尻彰宏、吳正科，〈漢蔵合璧西夏「黒水橋碑」再考〉，《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 22 號（2007，大阪），頁 1-38。

40 孫俏，〈甘肅交通石刻詞語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3），頁 82。

41 第 6 音節「དྒན་」（dgan）於王堯錄文中誤作「དྒའ་」（dga'），筆者依照拓片改正。本文的藏文轉寫均採 Extended Wylie Tibetan System（EWTS）系統，以完整呈現古代藏文的特殊拼寫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42]以「ཡི་ག་བརྩི་སྒྲི」雙詞連用，意為「刻寫字者」，與「瀉」缺乏關聯。[43]

復參照多種拓片，「瀉」字右側的「寫」字寬度，與下方的「字、使」等字同寬，且於早期拓本中無此「氵」，顯示左方出格的「氵」可能是由後人刻上，或者風化刮痕恰巧形成狀似部首的假象，恐非原碑刻寫時已有者。[44]筆者認為綜合上述，釐正為「寫作使安善惠刊」，可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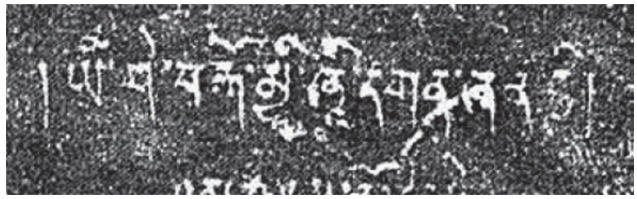
42 「བརྩི་བ」為「རྩི་བ」的未來式（ཟླ་འདོན་པ），意為「刻、寫」。「སྒྲི」為「སྐྱེ」的古代寫法，意為「人、者」，該正字法從吐蕃時代，藏傳佛教前弘期的藏文即如此規定。卓尼・札巴謝珠文集中有所謂「ཁེར་གྱི་ཡི་ག་པ་ནི་དཀའ་བཅུ་བློ་བཟང་དབང་ལྡན་གོ་ཁེར་ཤིང་བརྩི་སྐྱེ་དག་འདུན་ཆོ་རིང་།」（版本書手「དཀའ་བཅུ་བློ་བཟང་དབང་ལྡན་གོ」、雕版者「དག་འདུན་ཆོ་རིང」）之語，可知「བརྩི་སྐྱེ」確為刻寫文字者，可供對照。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ཙོ་ནེ་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ཀྱི་གསུང་འབུམ 14》[*co ne grags pa bshad sgrub kyi gsung 'bum 14*]（ཞེ་ཅིན：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ཁང，2009），頁 86。

43 「瀉作」二字，在宋代以降的漢籍中，不是一個具有完整意涵之獨立語詞，多僅出現在描寫瀑布飛瀉，或醫籍中描述瀉症及脈象的語句之間，未見連用者。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有言「按凡傾吐曰『寫』。故作字作畫皆曰『寫』。俗作『瀉』者，『寫』之俗字。周禮以澮寫水。不作『瀉』」。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7 篇下（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韵樓版），葉 11a。又顧藹吉認為「《禮記・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寫』與『瀉』同。楊君〈石門頌〉：『下則入冥，庾寫……』，『瀉』亦作『寫』。」見顧藹吉，《隸辨》（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1743〕黃晟刻本），卷 3，葉 54a。然而這些將「瀉」作「寫」的例證都出現在漢代及漢代之前，且僅以「寫」表「瀉、傾、去水」之義，並無以「瀉」表「寫字」之義者。唐代之後，兩字絕少通假。至元代周伯琦《六書正譌》時已有「寫：……，剔[sic!]〔筆者按：依上下文體例格式，「剔」字應作「別」〕作『瀉』，非」之說。周伯琦，《六書正譌》（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1631〕宋晉刻本），卷 3，葉 28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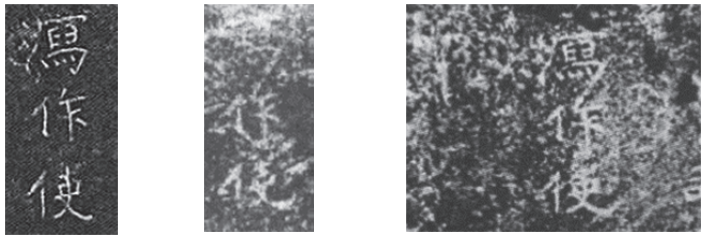
44 佐藤貴保等人認為漢文碑面的「瀉」字是原刻文無誤，為「寫」字之誤寫。參佐藤貴保等，〈漢蕃合璧西夏「黑水橋碑」再考〉，頁 10。筆者以為非也，論據已詳述於上。又部首「氵」之產生，恐與後人於碑面筆畫填粉上色有關。從該文所附圖版 Plate 1 可知，佐藤貴保等人使用的漢文底本，是碑面的照片，並非拓片；碑面字口明顯有上色，不能忠實表現碑文原貌（見本文圖二〔左〕）。筆者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河建橋碑」早期拓本（編號：各地 3364，局部見本文圖二〔中〕）可知，該本傳拓當時，「寫」字左方並無「氵」部。比較目前可見 3 種拓片（中國國圖、本書及前作），看似「氵」的筆畫，與此行左方的漫漶石花無異。而同類的風化凹陷，遍布全碑（見本文圖二〔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免繼續拘泥於「瀉作」二字之上，費神解釋（參見圖一、圖二）。



圖一　「西夏黑水建橋敕碑」拓片局部，為藏文對譯之「寫作使安善惠刊」



圖二　〔左〕「西夏黑水建橋敕碑」碑面照片，為字口填色後現狀，「寫」左側有清晰的「氵」部首，但「氵」明顯超出「作使」二字左緣；
〔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拓片，並無「氵」；
〔右〕《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所附拓片，看似「氵」者，與左右風化痕跡似無二致。

5. 賀蘭山岩畫中的西夏文題刻

筆者對書中「賀蘭山岩畫西夏文題刻」（頁 279）有個疑問。這處岩畫的左側有 5 個西夏文字，過去的研究中，李祥石、賀吉德等人認為應譯為「正法能昌盛」，[45]許成等人認為是「德法盛苗牙善」，[46]韓小忙等人

45 李祥石、朱存世，《賀蘭山與北山巖畫》（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頁 84；賀吉德、丁玉芳，《賀蘭山賀蘭口岩畫》（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7），頁 55-56。後者《賀蘭山賀蘭口岩畫》書中雖有西夏字的摹本，然筆畫譌奪，無法據以研究。

46 許成、衛忠編著，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輯，《賀蘭山巖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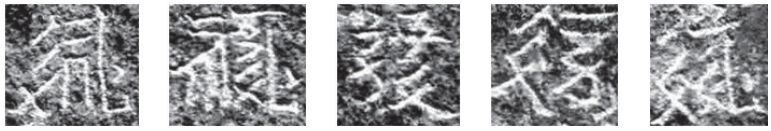
則認為是「正法昌盛能」，[47]諸說紛陳，差異不小。而在此書或其前身，關於該西夏銘文的說明均承襲上述諸說：

> 位於寧夏銀川市西北約 60 公里處的賀蘭山賀蘭口。在（高 47 釐米、寬 32 釐米的）人面岩畫左側，題刻西夏文五字，意為「能昌盛正法」。[48]

諸家所見四種解讀，皆未能提供與「能昌盛正法」五字相應的正確西夏錄文，漢譯文的根據究竟為何？難以尋索其對譯之理由。

筆者依照圖版，並且參照多種在賀蘭口拍攝的岩畫照片（見圖三），將 5 個西夏字謄寫如下：[49]

𗴂	𗹦	𗥃	𗖵	𗍫
tśhja²	tsjiir¹	wejr¹	ljij¹	khew²
正、平	法	茂	乙、苗	口



圖三　賀蘭山岩畫西夏文摩崖石刻

「𗴂𗹦」二字詞組，見於西夏語譯《妙法蓮華經》，凡四十八見。[50]又見

47 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西夏美術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89。書中認為應直譯為「正法昌盛能」，意即「能昌盛正法」。

48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8 冊，頁 173；杜建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頁 279。又見許成，《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頁 149。賀蘭山景區內，該岩畫前方的第 32 號解說牌上有一樣的敘述。上述著作中只有漢譯文，均無西夏錄文與討論過程。

49 這 5 個字的轉寫甚難，岩石表面凹凸不平，且文字筆畫有填色，不易看清楚正確的筆畫。

50 「𗴂𗹦」與「正法」的對應，最早由 Невский 提出一個《妙法蓮華經》VII, 20 的詞例。見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II*, p. 40. 筆者參考高橋まり代的整理，重新統計其數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西夏語《真實名經》222：[51]

𗍫	𗥃	𗹦	𗧓	𗍫	𗤓	𗵆
tśhja²	dwewr²	zji²	·jij¹	tśhja²	tsjiir¹	tjij¹
正	覺	諸	之	正	法	一、獨

是諸正覺唯正法

與之對應的漢譯為「正法」。[52]「𗏁」、「𗖵」二字為「繁茂」與「苗」之意。[53]而末字「𗥃」，應指渡口或隘口、缺口。[54]

由於該 5 字缺乏對譯為「能昌盛正法」之理由，考慮到這個摩崖石刻的位置在賀蘭口，正是賀蘭口溝中的峽谷狹窄隘口處，有可能是西夏人登臨其地後，就地命名並題記，或題記其地地名於該隘口處。「𗍫𗤓𗏁𗖵𗥃」或為「賀蘭口」的一種西夏語稱法，或即字面上的「正

51 林英津，《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頁 181。另見於行 376，亦譯為「正法」。

52 對應的藏文經文為「ཤངས་རྒྱས་གྱན་གྱི་བསྟན་ས་གཅིག」，句中與「𗍫𗤓」對譯之藏語為「བསྟན་ས」，即「佛法、教法」之總稱。見德格版〔རྡེ་དགེ〕藏文甘珠爾〈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སེམས་དཔའི་དོན་དམ་པའི་མཚན་ཡང་དག་པར་བརྗོད་པ〉《རྡེ་དགེའི་བཀའ་འགྱུར་པར་མ》（རྡེ་དགེ：རྡེ་དགེ་པར་ཁང་ཆེན་མོ，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8 世紀木刻本），通帙第 77〔ཀ〕函，葉 6a。

53 「𗏁」為「茂、榮、盛、隆、興、昌、強、熾」之意，西夏文《孫子兵法》中出現三次，均為偏正詞組「𗫂𗏁」（「霸王」－強國），中心詞置後修飾。或許此處「𗏁」也是修飾「正法」的定語。「𗖵」字常與「𗍊」並列提及，依照西夏文《繒毗》（同義）一書的分類，兩字都擺在穀物（𗍫）一類項下。西夏文《孫子兵法》33B-07a-18～21 有「𗍑𗖠𗖵𗦇」，對應漢文「馬逸犯禾」，「𗖵」對應「禾」。林英津，《夏譯《孫子兵法》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頁 3-120。「𗏁」、「𗖵」二字連用者還有另外幾處，將另文討論。

54 「𗥃」字於《同音文海合編》中解為「𗍊𗥃𗢭𗾔𗍊𗏁」（曰門口往來處）。此例句早由 Невский 摘出，然未注出處，亦無對譯。見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II*, p. 331. 後有韓小忙研究，韓小忙，《《同音文海寶韻合編》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495。實際應用上有「渡口、缺口」等意，發音 [khew²]，為漢語「口」之借字。前人疑將末字「𗥃」誤識為「𗦇」，因此出現「能」或「善」的釋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苗茂隘口」之意。[55]

不僅是西夏學，歷史上有許多胡語名義，在新資料、新想法出現之後，可以仔細檢視其論據，重新思考與研究。

（三）史事考究

本書作為党項、西夏碑石的整理研究，書中有部分碑石與党項、西夏人的關連可以再討論，還有繼續深入探究的可能，說明如下。

1. 李恒

河南的〈明故忠義官李仲墓誌銘〉（頁 246），[56]因誌文中有「遠祖諱恒」一句，而《元史》中「李恒」有傳，為「夏主」之曾孫，故本書認定「李仲」其人為西夏後裔，視該墓誌為西夏相關墓誌。

《元史・李恒傳》云：

> 李恒，字德卿，其先姓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忠從經略中原，有功。淄川王分地，以惟忠為達魯花赤，佩金符。惟忠生恒。[57]

對照〈明故忠義官李仲墓誌銘〉誌文：

> 孤遠祖諱恒，為元太祖總管。至世祖，陞副元帥，賜以寶劒，與宋合兵討金人。恒子諱三轂軫……，三轂軫子諱欽祖，仍襲舊職。（頁 246）

可知墓主「明故忠義官李仲」之遠祖「李恒」，在元太祖時已任總管。

根據《元史・李恒傳》及〈本紀〉的相關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

---

55 傳為岳飛所作〈滿江紅〉詞中的「賀蘭山缺」四字，特別是「山缺」，離開原詞語境脫脈絡地看，「賀蘭山缺」和「賀蘭口」、「山缺」與「豁」概念上有對應的可能。

56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8 冊著錄為〈明忠義官李公墓誌銘〉，見該書頁 167。

57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點校本），卷 129，〈李恒傳〉，頁 3155-3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恒傳〉的「李恒」卒，終年 50，以此推估，他大約生於 1235 年。[58] 然而 1235 年時，為太宗窩闊臺（1229-1241 在位）即位第 7 年，元太祖早已昇遐，這位「李恒」不可能如〈明故忠義官李仲墓誌〉所稱，擔任太祖的總管。又《元史・李恒傳》中生平皆是伐宋，未有如墓誌所述「與宋合兵討金人」之事。兩人的年代與事蹟無相同點，且文獻可稽的兩人子孫名均相異，無法依據子嗣勘同，很可能只是同名同姓者。[59]最根本的問題是，除了遠祖「李恒」二字與《元史・李恒傳》傳主恰好同名姓之外，並未出現任何與西夏相關的資訊，此碑與西夏的關係應再考慮。

2. 韓王李仁福子嗣之順序

書中還收錄一批出土自內蒙古烏審旗（ᠣᠣᠳᠣᠭᠠᠨ ᠰᠣᠮᠤ）無定河鎮十里梁、現藏於烏審旗文物管理所的後晉至北宋初年的夏州領導人家族墓誌，包含唐末党項首領拓拔（跋）思恭之子韓王「李仁福」之妻、兒、孫乃至曾孫輩的 7 件誌文，多有可與正史參合之處。[60]李仁福家族雄踞西陲，為五代、宋之強藩，中原政權每患之，屢藉賚賞或征伐以羈縻，史書中多有記載該地人事更迭。

若依李仁福妻瀆氏墓誌，李仁福有 5 子，依序為彝殷、彝謹、彝**昷**、

58 《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二年五月戊戌條：「陳日烜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適暑雨疫作，兵欲北還思明州，命唆都等還烏里。安南以兵追躡，唆都戰死。恒為後距，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毒發而卒」。〈李恒〉傳曰：「蠻兵追敗後軍，王乃改命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而趨。至思〔明〕州，毒發，卒，年五十。」見宋濂，《元史》，卷 13，〈本紀〉，頁 277；卷 129，〈李恒傳〉，頁 3159。

59 一個人可能有很多個兒子，祖述同一個共祖的不同後代分支，可能有子嗣完全不同的多種紀錄，共祖的不同後代，不一定有相同的人名。而此處筆者的意思是，因為兩者記錄的子嗣完全不同，連要依據共通子孫名勘同的可能性都沒有。實際上就兩者的生平記載，已無法歸為一人了。

60 計有〈大晉故虢王李仁福妻瀆氏墓誌銘〉、〈大漢故沛國郡夫人李彝謹妻里氏墓誌銘〉、〈後周綏州刺史李彝謹墓誌銘〉、〈故綏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誌〉、〈大宋故定難軍節度使李光睿墓誌銘並蓋〉、〈大宋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繼筠墓誌銘並蓋〉、〈大宋國故管內蕃部都指揮使李光遂墓誌銘並蓋〉等 7 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彝超、彝温（頁 123）。[61]但若參照瀆氏之子李彝謹的墓誌，關於他的兄弟卻是這樣描述的：

昆季四人，長曰彝温，守職隨使都押衙，次曰彝超。（頁 130）

加上彝謹本人，兄弟共 5 人，兩誌人數相合。但此誌兄弟之長卻為「彝温」，而非「彝殷」，與瀆氏墓誌大不同。李彝謹墓誌中只提到彝温、彝超 2 人，其餘缺載。還提到「公即韓王第二子也」（頁 129），韓王即李仁福。如果李彝謹確如其墓誌所稱為仁福第二子，恰合於其母瀆氏墓誌所載，但仍無法解釋為何在李彝謹墓誌中是「長曰彝温」、「次曰彝超」如此齒序，與其母墓誌大相徑庭。[62]「次」不一定是第二，而「第二子」則很確定就是第二個兒子。結合李彝謹墓誌中的兩個線索，彝謹誌中兄弟排行或作：彝温、（彝謹）、彝超。至於未提到的彝氳和彝殷 2 人，則不知應排在何處。

無論彝謹排行第幾，兩塊墓誌中的彝温、彝超之長幼次序完全相反，且彝温竟從其母墓誌中的居末，到彝謹墓誌中的居長。刻寫時間僅相差十年（942-952）的母子兩墓誌，關於彝謹兄弟的紀錄卻如此不同，實在難以解釋。

---

61 有稱「據李彝謹母《大晉故虢王妻吳國太夫人瀆氏墓誌銘並序》，李彝謹及其兄弟按行序依次為李彝温、李彝超、李彝殷、李彝謹、李彝氳」。與瀆氏墓誌次序不合，且未說明理據為何。見陳瑋，〈後周綏州刺史李彝謹墓志銘考釋〉，收入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36。按：陳瑋文中所指《大晉故虢王妻吳國太夫人瀆氏墓誌銘並序》，與本文註 60〈大晉故虢王李仁福妻瀆氏墓誌銘〉同。

62 或認為「根據李彝謹墓誌志文，李彝温與李彝超均先於李彝謹去世。這樣在李彝温與李彝超去世後李仁福諸子中僅存李彝殷、李彝謹、李彝氳。加之李彝謹逝世時其兄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仍然在世，所以志文稱李彝謹為『韓王第二子也』」。見陳瑋，〈後周綏州刺史李彝謹墓志銘考釋〉，頁 236。此說宜再考慮。首先，「第二子」是與所有兄弟比較的排行，兄弟是否已去世，無關墓誌中排行。再者，若依照瀆氏墓誌，李彝謹為第二子無誤，陳文所稱的排行（見註 61）依然與兩件墓誌不符，解釋也較為曲折。又李彝謹墓誌中未提到彝殷、彝氳，既無法確認或排除各種排行次序的可能，亦無法據以討論未提及者之年齒。例如李彝殷在其母瀆氏墓誌中排行長子，李彝氳排行第三，兩者在彝謹墓誌中皆未出現。不知陳文依據何種理由，將兩人分別排在第三、第五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僅如此，關於彝殷和彝超的排行，在史書上也多有齟齬。《宋史》〈夏國傳〉稱「彝殷」為避宋帝諱，改名「彝興」，為「彝超之弟」：

> 彝興，彝超之弟也，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諱，改「殷」為「興」。[63]

《舊五代史》卷 132 李仁福及其子彝超、彝興列傳中，也記載彝超之弟為彝興（即彝殷）：

> 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於鎮。弟彝興襲其位。[64]

《新五代史》〈李仁福列傳〉亦然：

> 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65]

可是在《冊府元龜》卷 389，二子之次序與前述正史相反：

> 劉遂凝為隰州刺史，長興四年遂凝至京，帝問所陳密事，……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66]

《冊府元龜》卷 439 有關李仁福的敘述，則有：

> 周李仁福為夏州節度使，後唐明宗長慶四年三月，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俸官齎延

63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點校本），卷 485，頁 13982。

64 佚文集錄自《永樂大典》卷 18133，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點校本），卷 132，頁 1749；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 點校本修訂本），卷 132，頁 2033。

65 歐陽修撰，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卷 40，頁 437。

66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389，頁 4625。此為明刊完本，該段之中均作「劉燧凝」。而臺北故宮藏宋蜀刊小字本《冊府元龜》此段作「劉遂凝」，影印本見王欽若等編，《宋本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389，頁 986。另前述明刊本之卷 172、805、994 亦作「劉遂凝」，又查《宋史》、新舊《五代史》均作「劉遂凝」，見脫脫等撰，《宋史》，卷 264，頁 9109；歐陽修撰，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卷 34，頁 370、卷 51，頁 577。此處引文據宋本《冊府元龜》及其他資料改「燧」為「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瑤為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為節度副使，彝超為延州留後。[67]

可知《冊府元龜》中均稱長子為彝殷、次子為彝超。依據瀆氏墓誌，彝殷確實居長，然而彝謹墓誌中卻是「長曰彝温」，兩者難以調和。作者認為應從瀆氏墓誌（頁 57），仍無法解釋彝謹墓誌所載。至於上述史書中諸多矛盾之成因，亦有待釐清。[68]

3. 西夏後裔

本書收錄碑銘的標準中，與西夏亡國後留存的「遺民及其後裔」有關者也在收入之列。近代論著中的「西夏遺民」概念模糊，既有單指「党項人」者，亦有泛論「夏國境內眾民族」均屬之者，「族屬」與「地望」兩種不同的指涉對象，在討論時常相互混淆。[69]

學界在指稱「契丹遺民」、「女真遺民」時，均不涉及非契丹人與非女真人，也未見遼國、金國境內的其他民族被視為契丹或女真之「遺民」。[70]而西夏學研究中，「遺民」為何包含非党項民族，恐怕是因為

---

67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 439，頁 5209。此段無現存宋本，依明刊本為準。

68 該頁腳註 1「《大晉故虢王妻吳國太夫人瀆氏墓誌銘並序》載，李彝殷為彝超弟」，此處「弟」字應作「兄」，方合作者原意。

69 相關著作甚夥，個案研究的論著多專論党項族後裔，而列舉西夏遺民的著作則收納廣泛，不侷限於党項人。如湯開建著〈增訂《元代西夏人物表》〉登載近 500 人，明言「所謂西夏人並非指党項族」，凡記錄上與西夏故地有關者均收錄。湯開建，《党項西夏史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481-510。鄧文韜繼踵其後，整理了先行研究，且補充湯表未收之人。見鄧文韜，〈蒙元時期西夏遺民人物補表〉，收入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1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302-303。鄧文認為學界目前對「西夏遺民」的定義為「生活在西夏滅亡之際的唐兀人和他們的子孫後代」（頁 303），而其實際列舉人物時，則將「朔方人」（頁 307）、「寧夏人」（頁 308、309）、與身分顯為明代蒙古人的「河西大族」（頁 309）都列入，可見其「唐兀人」標準還包含「河西人」、「寧夏人」等不一定專指党項人的人群。

70 苗天娥，〈關於我國女真遺民的研究〉，收入景愛主編，《遼金西夏研究年鑒 2009》（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頁 63-75；任崇岳，〈河南省完顏姓女真遺民探析〉，《中州學刊》2009 年第 1 期（鄭州），頁 174-179；孟志東，《雲南契丹後裔研究》（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夏」一詞的性質所致。遼、金為朝代或國名，契丹、女真為民族名，編纂這兩個時代之文集或金石集成時，以朝代名「遼、金」為定語即可，不以民族名「契丹、女真」指稱。[71]而「西夏」卻同時可指稱其國與其民，為求全故，前人對「西夏遺民」從寬認定，避免遺漏。從寬原為俟後考察，定義最終仍需盡可能精簡、收攏至「党項族」本身為佳。[72]碑銘中大部分人物事蹟雖史籍缺載，或名不見經傳，若仔細審視史料，依然存在一些可供討論的空間。以下兩則是建立在「西夏遺民、後裔必須是西夏（党項）人」前提之上的嘗試。

例如本書收錄的〈福州等地靈武王用文題刻〉（頁 300）、〈潮州金山西南麓靈武王用文題刻〉（頁 301）、〈汕頭白牛岩及東山王用文題刻〉（頁 302）等，若僅憑落款中的「靈武王用文」即斷定其為西夏後裔，實有疑義。[73]靈武在唐代屬靈州，宋初陷於夏國，改為翔慶軍。歷代都有設治，不可能靈武全區的居民皆為西夏人。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河南〈元宗密圓融大師塔銘〉（頁 233，以下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周峰，〈契丹遺民今何在〉，《尋根》2006 年第 3 期（鄭州），頁 16-20。

71 例如王新英，《金代石刻輯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陳述輯校，《全遼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劉鳳翥、唐彩蘭、青格勒，《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專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72 「党項族」為民族史上對西夏人先世以至西夏人的民族統稱，屬文化、政治上的身分概念。「西夏」雖為國名之稱呼，但「西夏語」卻專指党項語，而非境內其他民族語言。同樣地，縱然「西夏人」與「河西人」在歷史文獻上指稱不一定明確，歷史上的民族邊界也不易辨識，學術用語還是必須盡可能明確規範其定義。學術討論中「契丹人」、「女真人」不會泛指遼國、金國境內所有各族人民，「西夏人」亦應如此。

73 王翰（1333-1378），字用文，歷代記載多稱其為靈武人。然依其家譜，先世為「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為邊患，寶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逮中原為金所併，不能自還」、「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昊者。其宗族在東河陽穀甚盛。國初附屬時，其高祖卽復歸山東，沒從其族，葬陽穀」。見吳海，〈王氏家譜序〉，《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收入《重刊正誼堂全書》（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重校、福州正誼書院增刊本，1869），葉 16b。從這些記載可知，王用文實為陷蕃漢人之後，他與「西夏」有關連，但非西夏人後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簡稱「塔銘」）中的傳主「楊慧覺」，許多學者均認同其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以下簡稱《華嚴懺儀》）之作者「蘭山雲巖慈恩寺護法國師一行沙門慧覺」，又因此認定此人與西夏佛經序中提到的「一行沙門慧覺」為同一人，幾成公認定論。[74]然而相關推論仍缺乏確實證據，未能將塔銘中的「楊慧覺」，與西夏文獻中的「一行沙門慧覺」成功勘同。[75]塔銘雖記載墓主「公諱慧覺，楊氏，姑臧人。父仕西夏為顯官」，但依據出身地或姓名仍無法確定族別，不一定只有身為西夏党項人才能在西夏擔任大官。北宋陝西華陰人張元投奔西夏，官至國相，為著名的非党項人擔任西夏顯爵之例，可知「父仕西夏」並不具有族屬的必然排他性。且元人常採用外族姓名，很難單從姓名得知其出身，王、楊都是西夏常見的漢姓，不能確認或排除其人身分，也無法據以判斷族屬。[76]

依據姓名勘同人物，不一定準確，前文對「李恒」的討論已為實例。此處圍繞著「慧覺」，又引出一系列值得討論的問題。佛教界至少從明末開始，數百年間《華嚴懺儀》之作者均書為「〔唐〕蘭山雲巖慈恩寺

74 已有多位中外學者提出相近的見解。回顧見索羅寧，〈一行慧覺及其《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臺大佛學研究》第 23 期（2012 年 6 月，臺北），頁 1-76；崔紅芬，〈僧人「慧覺」考略——兼談西夏的華嚴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4 期（北京），頁 47-57；李燦、侯浩然，〈西夏遺僧一行慧覺生平、著述新探〉，收入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76-190。聶鴻音則獨排眾議，認為「慧覺」可能是吐蕃僧人 ཤེས་རབ་བྱང་ཆུབ 之譯名，見聶鴻音著，《西夏文獻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246。

75 確切地說，《華嚴懺儀》的作者「一行沙門慧覺」與西夏文《金光明經》序的作者「𗍫𗥃𘝵𗫂𗥤」應為一人，但「元宗密圓融大師塔銘」中的稱號，除「慧覺」二字外，與前述夏、漢文獻全無相同之處，目前的證據難以將二者勘合為一。註 74 及其他相關著作有以「1.現存佛經題記中僧人『一行慧覺』和《塔銘》所記『慧覺』同為西夏遺民，生活在西夏末年至元代初期；2.與河西地區有密切關係；3.法名相同；4.都精通華嚴義理」等理由，認為塔銘與題記所載為同一人。然上述諸點均為旁證，目前尚無可確定年代、地點、生平之確切紀錄曾經同見於兩方。至於認為塔銘與佛經題記的記載可以「互補」者，實為兩方史料各說各話，缺乏交集的現象所致。

76 相關討論可另參李燦、侯浩然，〈西夏遺僧一行慧覺生平、著述新探〉，頁 180-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護法國師一行沙門慧覺」，[77]將西夏的「一行沙門慧覺」認為是唐代著名的一行法師（683-727），[78]甚至指稱「慧覺」為「一行」之弟子，[79]上述誤會皆因同名「一行」而產生。如今若又因名字另一部分的「慧覺」相同，將塔銘中的「釋源宗主宗密圓融大師」與西夏僧人「蘭山雲巖慈恩寺護法國師一行沙門慧覺」合一，而無合理的生平事蹟對當為基礎，可能會因文字障翳目，形成與歷代誤識「一行」類似的問題。

西夏文文獻所載之「一行慧覺」曾於 1247 年撰《金光明經》序。[80]學者曾推測「撰序之時，慧覺不能小於 20 歲，表示他大概在 1225 年左右出生，在西夏生活過」。[81]但 1225 年距離西夏亡於蒙古的 1228 年僅 3 年時間，而《華嚴懺儀》中卻將「一行慧覺」與諸帝師、國師同列為「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82]在西夏存續之時日尚且童稚懵懂之嬰孩，要躋身大夏國高級僧官之流，可能性甚微。而 1225 年生人，至 1247 年時僅 22 歲，有無能力或相應地位，領銜重整西夏國已毀之經版，且擔負撰集全經並賦序之重責，也較可疑。諸多疑問指向撰《金光明經》序的慧覺，在 1247 年時可能已是中年人，才能解釋上述文獻紀錄。假設慧覺 1247 年時 40 歲，那麼他約為 1207 年生人；若據塔銘所載，楊慧覺「皇慶二

77 《明版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第 15 冊，頁 2-553；前田慧雲編，《大日本續藏經》第 1 輯第 2 編乙第 1 套第 3 冊（京都：藏經書院，1910），葉 199-297。此謬最早由周叔迦摘出，見周叔迦，〈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4 卷第 3 號（1932，北平），頁 2765。相關討論見白濱，〈元代西夏一行慧覺法師輯漢文《華嚴懺儀》補釋〉，收入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 1 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頁 98-100。

78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醫學書局，1929），頁 21；任繼愈主編，《佛教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1206。

79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頁 43。實則「一行慧覺」是一人之名號，不可離析為二人，甚至誤植兩者間有師徒關係。

80 關於西夏文《金光明經》的刊印過程以及西夏文序言的譯文，見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跋考〉，收入氏著，《史金波文集》，頁 332-346。

81 相關討論很多，前人已經注意且考慮過各種可能，但因文獻缺載，對慧覺的出生年代很少著墨。筆者以為在此個案中，基於史料，對年歲進行推理或是可行的切入突破點。

82 《明版嘉興大藏經》，第 15 冊，頁 5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五月甲寅卒于白馬寺」，則他於皇慶二年（1313）逝世時已臻 106 歲。如此耆壽乃國之祥瑞，塔銘中卻不置一詞，難稱合理。從各種線索考慮，可知塔銘之墓主，與西夏文獻中的「一行慧覺」為同一人之推測，就現存的資料而言，尚有未迨。[83]

涉及「元明時期西夏遺民及其後裔」的碑石，都應該多加考慮，站在前人的基礎上，需要更明確的證據才能確定族屬。

4. 「感應塔」與「感通塔」問題

前文多次提到〈凉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如腳註 6 已述，此碑為西夏文字湮沒數百年後，再次為世人所知的契機，公認為西夏學肇基之重要文獻。從腳註 34 的參考書目中，可以發現相關論著有書為「感應塔」，亦有作「感通塔」者。從西夏學創始之初，首先成為學者研究題材的這塊石碑，百年來竟然尚未能確定名稱，有必要略加敘明。

本書著錄該碑石為「西夏凉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頁 150），現有的工具書中，這塊碑亦多著錄為「（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84] 196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一次公布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第 130 項即為「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西夏碑）」。[85]「感應塔」一詞有多

83 即使以低估且不合理的 1225 年生之說，至 1313 年謝世時，慧覺也已 88 歲，為世所稱羨之嵩壽，塔銘中卻未提及，也值得再考慮。又據塔銘記載推算，其 6、70 歲（若依 1207 年生假說，則為 8、90 歲）時還多次在河南與甘肅之間來回奔走，往復數千里，亦與其年歲不甚相合。筆者不反對前人提出將此塔銘與西夏史料中兩位「慧覺」勘同的假設，然現有理據尚未足以調合記載，期待能有新出史料更有力地考證之。

84 較重要的辭典，如高文德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史大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932；郭方忠、張克復、呂靖華主編，《甘肅大辭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0），頁 478；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936-937。此外還有十餘種，茲不一一列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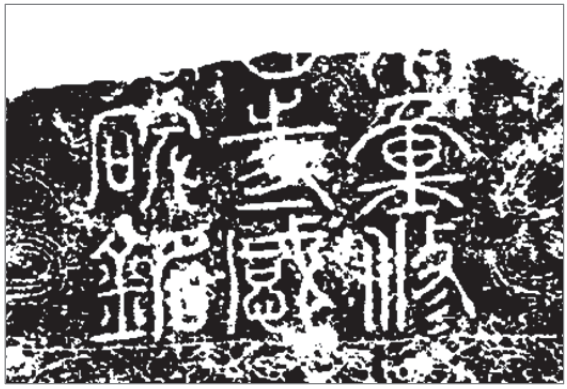
85 中國國家文物局文物處，〈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收入氏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資料匯編》（北京：中國國家文物局文物處，1961），頁 18。電子全文見〈國務院關於公佈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通知〉（1961 年 3 月 4 日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uoqing/2014-07/21/content_2721152.htm（2017 年 10 月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工具書認可，又經國家核定頒布正名，理應較無疑義。

根據上述書籍記載，此碑碑額已標明碑名，如「額篆『凉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86]、「首刻漢文小篆《凉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87]，本書也持同說「碑額篆書『凉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頁 150）。

然而實際的情形卻與上述記載相左，此碑碑文從頭至尾，包括漢文碑額，皆未見「感應塔」三字。從清代拓片來看，漢文碑額上方早已殘去將近兩字（見圖四），僅存「□州重修／□國寺感／□塔碑銘」，「感」字後一字已毀，不見「應」字。不僅如此，原本可能書有碑名的漢文面第一行也已殘去不存。此碑究係何名，從碑額與碑文開頭均無法得知。前人所謂碑額為「…感應塔…」云云，恐係訛傳，並無根據。



圖四　感通塔碑漢文碑額局部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代拓片。

此碑出土伊始，拓片已四處流傳，一時金石家趨之若鶩，紛紛往觀或求得拓本，因而保存了該碑早期狀態的珍貴記載。從清末金石著作以及同時期拓片中，可確知當時漢文碑額已殘缺如現狀，不見碑文記載有

86 郭方忠、張克復、呂靖華主編，《甘肅大辭典》，頁 478。

87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頁 936-9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應塔」3 字，且諸家率皆錄名為「感通塔」。[88]考其原因，正因碑額不全，故據碑文署名頭銜中「感通塔兩眾」、「感通塔漢眾」、「護國寺感通塔番漢四眾」等語以擬補碑名。

其實目前公認的「護國寺」之「護國」二字，也不見於殘缺的碑額與碑首標題，同樣是從碑末署名中推知。如果可以接受以漢文碑面的「護國寺感通塔」將「護國」補入碑額缺字處，應該同等對待同一文句中的「感通塔」，而無須固守難以解釋之「感應塔」。

又此碑有西夏文面，對應塔名的西夏文為「𗍫𗥃」[mjijr² dźjij²]，「𗍫」在西夏文《華嚴經》、《妙法蓮華經》中可對應漢文「神通」（𗅋𗍫）之「通」。[89]相較於缺乏書面證據的「感應塔」一說，漢文碑面本身多次出現的「感通塔」加上西夏文面的輔證，是較為符合夏漢對勘結論的選擇。

（四）餘論

和全書其他碑石不同，書中頁 192-193〈大夏國葬舍利碣銘〉、〈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軌〉兩件原石已失，係移錄自明代《寧夏新志》。如果這類非傳世的金石文字都要收入，那麼宋元文集中與西夏相關的神道碑、墓誌銘可說不勝枚舉，還有很大的增補空間。若這些未能參照原石的碑銘數量大量增加，與本書的體例就有所衝突了。

再者，若將提及「西夏」、「靈武」、「河西」、「唐兀」、「党項」等語詞的碑銘都視為應收錄的「党項」、「西夏」碑石，標準寬泛，內容會

88 如陸耀遹纂、陸增祥校訂，《金石續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同治十三年〔1874〕毗陵陸氏雙白燕堂刊本），卷 20，葉 1a；葉昌熾撰，《語石》（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宣統元年〔1909〕長洲葉氏刊本），卷 1，葉 28a-b；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四年〔1925〕吳興劉承幹希古樓刊本），卷 122，葉 14a。

89 出現次數合計達上百次。雖然實際的單字語意並不一定只是「𗅋＝神」、「𗍫＝通」一種解釋，但夏漢文佛典間有此種對應，且「神通」占對應中的大宗是可以確定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得蕪雜且不易集中。[90]究竟體例要如何設定，才能兼顧豐富性又不失其主題專一性，是西夏金石學研究者值得思考的問題。

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國金石拓片集《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僅於金朝拓片之末附有「西夏」一項，共 2 件碑銘，[91]而收錄歷代金石資料最完整的《歷代石刻史料彙編》與《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兩種大型叢書，[92]都沒有專門設立西夏金石的篇章或段落。

無論從提供史料，呼應學界歷史考證需求，或者彌補歷代乏人纂修西夏史籍之缺憾，《中國藏西夏文獻》〈金石編．碑石、題記卷〉以及本書《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的付梓，已成為重要的里程碑，更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籍。[93]期許日後新編的党項、西夏金石書籍能收錄更多經過精細考證的碑石資料以及清晰的舊拓，為後續研究鋪平前行的道路。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洪麗崴　李　頎）

90 例如本書收錄的清人「《謁余忠宣公墓》篆書詩碑」（頁 261-263），某種程度上與党項西夏史關係不大。如果連後人提及或稱頌党項、西夏（人）的文字都視為西夏史料，則數量實在太多。

9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 47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頁 184-187。此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石刻拓本目錄也於「遼金」卷單設西夏段落，共 1 件。見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 159。

92 中國國家圖書館金石組編，《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93 一般金石書籍，多以政權分類、以年代先後為排序標準。註 91、92 所提四部金石集成，均依碑石落款所奉年號正朔為分類依據。許多金石著作或有收錄部分西夏碑石，但書有西夏年號的碑銘數量較少，難以成帙，常混合於其他時空、朝代、地區的碑銘之間。筆者認為，以族屬為樞紐，編纂跨年代、跨地域的金石總集有其必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